



# 离乱弦歌忆旧游

赵瑞蕻◎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 离乱弦歌忆旧游

赵瑞麒◎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离乱弦歌忆旧游/赵瑞蕙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2

ISBN 978 - 7 - 216 - 05475 - 1

I. 离…

II. 赵…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0034 号

离乱弦歌忆旧游

赵瑞蕙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数:276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20  
插页:4

版次: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数:1 - 6 000

印次: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50 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475 - 1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 序言

## 又一片树叶落下

杨 苾(南京)

赵瑞蕻走了。各种方式的吊唁和慰问像沉重的铁锤不时地锤打着我的心，更带来了友情的温暖，这沉甸甸的友情将带领我从严冬走向春天。十二平方的小书房兼客厅中的一角，书桌上依旧零乱地堆着书籍、字典、信件、复印件和铺开的稿纸。书桌旁那张坐了几十年的破旧木椅似乎还在等待着头天晚上还在伏案工作，这之后早已回房安睡，却迟迟还没回到书桌旁的老爷子。

有一排字典斜靠着那剥落的墙面，上面竖着一张复印件，篇名是《读巴金先生的一封信》。这是头一天刚收到的《文汇报》剪报。最近我拿出文



赵瑞蕻一生教书、翻译、写作、工作不辍。图为他工作时在书桌前留影



物是人非，忙乱的书桌似乎静静地等待它的主人归来。

井兄的十几封旧信。这些信使我感慨万分，这样也触动了赵瑞蕻。他也开始整理朋友们给他的旧信，毕竟我们已经很老很老了，余日无多，我笑对他说：“没什么可怕的，该考虑身后之事了！”

萧乾兄在不久以前还神采飞扬地庆祝他的九十华诞，然而骤然谢世了，顿时使我陷入一些陈年旧事的梦中，我说：又一片树叶落下了。下一个人该是谁？

赵瑞蕻拿出一封旧信，大概是萧乾兄前几年写的，称赞说：“写得真好！”他准备先写一篇谈萧乾兄的翻译，然后再在纸上谈论这封信。这是两个老人极为真诚坦率的谈心。我从来不想把朋友们的谈心公开，但是眼下应该说是知识分子比较宽松的年代，我对赵说，完全可以就这个内容写一点感想，都这把年纪了，就得说真话！

信仍然摆在桌上，稿纸铺开，几小时后急性大面积心肌梗塞把赵匆匆带走，时间是己卯年年三十春节，凌晨二点十五分！

继续和萧乾兄神聊吧，在另一个世界。萧乾兄又将笑咪咪地对我们说：“我做不到巴金的句句讲真话，但是我可以不说假话！”赵又在激动地叫：“我还顾忌什么？我已风烛残年！”

又一片树叶落下……

1999年3月2日急就

# 目 录

## 1 序 言

### 第一辑

- 2 自 传
- 16 离乱弦歌忆旧游——纪念西南联大六十周年
- 39 当敌机空袭的时候
- 45 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苏先生
- 65 梅雨潭的新绿——怀念朱自清先生
- 74 红烛颂——纪念闻一多先生
- 79 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纪念吴宓先生
- 96 想念沈从文师
- 116 一个时代心灵的记录——纪念冯至先生
- 127 岁暮挽歌——追忆钱钟书先生
- 132 南岳山中,蒙自湖畔——怀念穆旦
- 153 追思旧谊——怀念许国璋学长
- 161 长留双眼看春星——忆王季思先生
- 165 重读《云梦断忆》——纪念陈白尘先生
- 174 梦回柏溪  
——怀念范存忠先生,并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 190 一颗燃烧的心与生命的开花  
——读巴金《随想录》和卢梭《忏悔录》
- 207 记杨宪益与戴乃迭

## 第二辑

- 216 读严文井的一封信
- 219 读萧乾的一封信
- 224 读黄裳的一封信
- 228 读冯至先生的一封信
- 233 读沈从文先生的一封信
- 237 读巴金先生的一封信
- 247 读柳无忌先生的一封信

## 第三辑

- 254 我与比较文学
- 261 西方的“红学”
- 271 旅途中的遐思(一)
- 275 旅途中的遐思(二)
- 285 重来香港漫记
- 298 瓯海在呼唤
- 305 籀园,我深挚美好的思念
- 312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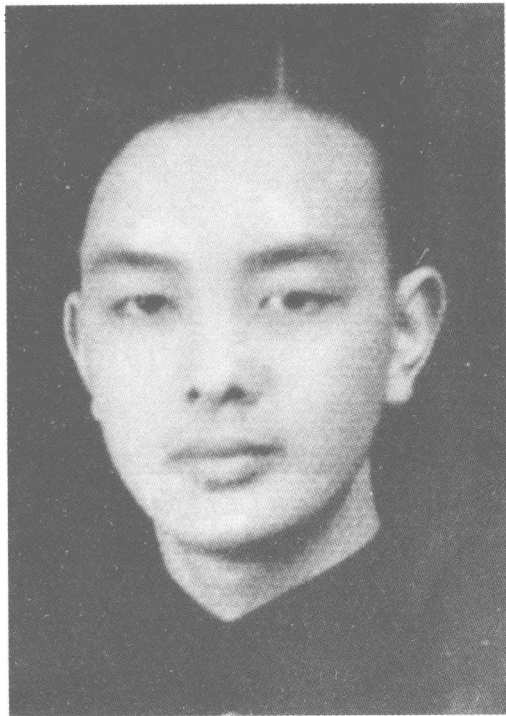
# 第一辑



## 自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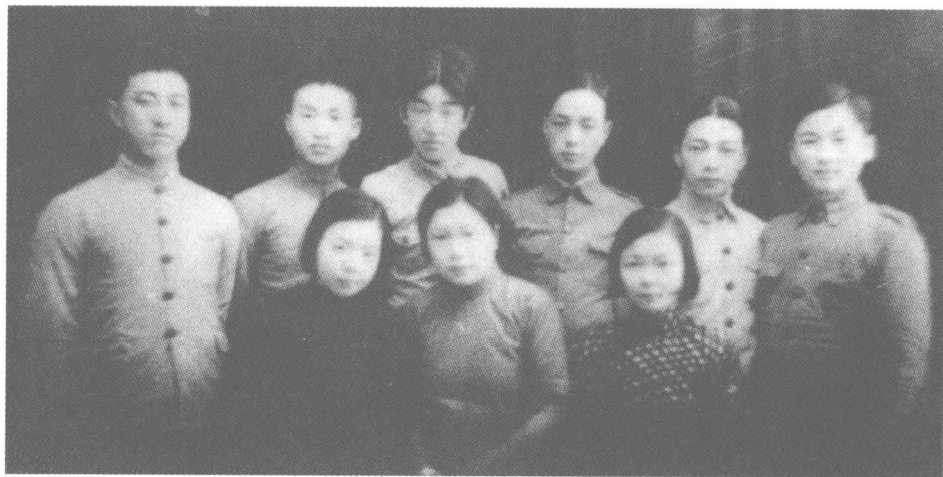
赵瑞蕓,原学名赵瑞霖,后通用笔名赵瑞蕓;曾用笔名阿虹、瑞虹、朱弦、朱玄等。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农历乙卯年十月二十二日,属兔)生,浙江温州市人。父亲赵承孝,字八铭,上过几年私塾,读四书、古文,会写一笔端秀的正楷字,后长期经营茶叶,又当一家茶行经理;他勤俭忠厚,乐善好施。母亲林繁,略识字,却能背诵几十首唐诗,这对我后来学诗、写诗有相当影响。我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我的二哥赵瑞雯研究古典文学,擅长诗词,我的三姐赵璧也爱好文学,善于写字、画花卉;这些也使我小时受到熏陶。我虽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很受宠爱,但并没有因此惯坏了我,倒能自觉用功读书,不依赖父兄督促。我从小就喜欢幻想,赞美诗神,喜欢美术;上小学前,曾跟一位老先生学过一年多山水花鸟画。我从读小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附属小学,又名模范小学)起,就较幸运,受到良好教育。一九二九年夏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免试保送十中(后改称为温州中学)初中部学习;一九三二年夏考入高中部。第二年五月,与同班男女同学六人发起

组织“野火读书会”，吸引了不少同学。我起草了《野火宣言》和《工作纲领》，印成小册子。我们阅读进步书刊，讨论时事，关心民族兴亡，宣传抗日救国。后来参加的同学很多，逐渐形成了当时温州地区青年学生中一股强大的进步力量。一九三三年秋，我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学术股长，主编、出版综合性刊物《明天》创刊号；我最初的一些诗作（如《秋天里的秋天》）和译作（如法国短篇小说《失去了的星星》）就登载在这上面。次年六月，我协助国文老师陈逸人先生编辑、出版大型学术杂志《中国文学》（前后出过两期），我最初两篇



就读于十中（即后来的温州中学）时的赵瑞夔

较长的论文（如《江西诗派与永嘉四灵》）就发表在这个难得的园地中，我在温中读书的六年中，得到许多好老师非常认真亲切的教导，尤其是几位国文老师和英语老师——王季思、许笃仁、陈逸人、陈楚淮、夏翼天、叶云帆等先生，为我以后专心致志学习和研究中外文学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还有教中国史的吴文祺先生，他使我们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知识；我曾试以这种新观点，写了一篇《建立科学的中国文学史刍议》的论文，发表在《中国文学》创刊号上。一九三四年春，在吴先生的影响下，我还和校内外几个同学朋友出版了《前路》刊物，宣扬革命思想，请吴先生写了发刊词，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密切注意，就被迫停刊了。我父母亲非常紧张，深夜和我在灶间烧掉三四百本还未发出去的两期《前路》。关于我在温中学习的情况，我为母校八十周年（一九八二年）和九十周年（一九九二年）两次校庆纪念特刊写



“野火读书会”成员集体合影。后排左起第四人为赵瑞蕤

的两篇散文(前者是《瓯海在呼唤》,后者为《我与比较文学》)中有较详尽的叙述。

一九三五年夏,我高中毕业后,入大夏大学中文系(当时系主任是著名翻译家、法国文学专家李青崖先生,这也是件巧事)。一面读书,一面与朋友们组织了“五月社”,参加一些地下革命活动,秘密出版《中国青年行进》,曾把这刊物两期送赠鲁迅先生,向他请教,当时情景仍淹留心上。同年冬,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一九三六年夏,重新考入青岛山东大学外文系,除继续学习英文外,以浓厚的兴趣,开始努力学习法文,为以后翻译《红与黑》等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一九八一年山大八十周年校庆时,约我写纪念文章,我写了篇散文《碧海红樱忆旧游》)。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回到故乡,立即与许多同学朋友在一起,组织了“永嘉青年战时服务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年十月十九日,我们召开了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由我作报告,并在《浙瓯日报》上发表纪念文章(这是我向鲁迅学习,研究鲁迅著作的第一篇东西);会后举行了十分热烈的示威游行。十月底,我和几个同学赶到长沙,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即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战时联合组织,西南联大前身)外国语言文学系二年级继续求学。当时临大文学院设立在南岳衡山

中,在那极其可贵的机缘、特殊的环境中,我得到了这三座学府许多著名教授的亲炙和深刻的启发,其中有吴宓、叶公超(外文系主任)、柳无忌、罗皑岚、吴达元、燕卜苏(William Empson,英国诗人和文论家)、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等先生。一九三八年初,因日寇南侵,威逼武汉,临大奉命西迁昆明。我和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越南入滇;临大也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了。因昆明校舍不够,文、法两学院暂设蒙自,四月继续上课。也就在那个很有点浪漫情调、南国风味的边城里,我和外文系、中文系十五个爱好诗歌的同学结了一个

“南湖诗社”,请朱自清、闻一多两位教授担任导师。当时我写的一首长诗《永嘉籓园之梦》(描绘温州落霞潭的风光,思念炮火下的故乡。为纪念晚清杰出学者和教育家孙诒让而创立的籓园和图书馆就在落霞潭畔)得到了朱先生的好评,认为是一篇“力作”(五十二年后,即一九九〇年,在蒙自县委和红河州文化局的支持下,蒙自恢复了“南湖诗社”,建造了闻一多纪念碑和纪念亭;并聘请几位现尚健在的当年诗社成员为名誉社长,我是其中之一)。同年九月,联大文法两学院搬回昆明,我们的诗社也更名为“高原文学社”,有四五十人参加。在一次文艺晚会上,我认识了外文系女同学杨静如(后通用笔名杨苡)。同时,我还读了沈从文先生和杨振声先生合开的“新文学与习作”一课,因此我常向沈先生请教;我那时几首诗都是承沈先生看后,代为发表在《今日评论》等报刊上的。其中一首长诗《一九二九年春在昆明》抒写敌机空袭昆明,



1952年赵瑞蕻一家人合影。左起:赵苡、杨苡(怀里是儿子赵苏)、赵蕻



四十年代的赵瑞蕓

联大师生跑警报的情景以及我自己的感受。这首诗当时并不感到怎样,现在看来,倒是一个有意义的记录,一幅难忘的画像。一九四〇年夏,我毕业后,就在美籍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先生主持下的“基本英语学会”(Basic English Society)任职,并在南菁中学教英语,开始了我以后五十年的粉笔生涯。这时,我也认识了巴金先生,他长期给我热诚的鼓励和帮助。一九四〇年,我和杨苡特地挑了“八·一三”这个纪念日,在昆明风景区大观楼结婚了,杨苡与我一样爱好西方语言文学,后来翻译了《呼啸山庄》等文学名著;她也喜欢写诗,尤

长于散文,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又在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当了二十年教师。后来,我们有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各自学习音乐、绘画和电视艺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因杨苡已先带我们初生的孩子小苡飞往重庆,与从天津迁居那里的母亲、姐姐住在一起,于是我就告别了永远怀念着的昆明(一九八八年,联大建校五十周年时,我写了一篇散文《弦歌烽火忆春城》),冒险搭运货卡车,在滇贵川公路上翻山越岭,走了七八天,几经危急,才安抵重庆,开始了我另一阶段的生活经历。关于在西南联大读书三年情况,我在《怀念朱自清先生》和《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苏先生》两篇散文(现均收入拙著文集《诗歌与浪漫主义》一书中)里有较多的抒写。抗战八年中,西南联大在那样艰苦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下,敌机时常空袭骚扰中,弦歌不断,坚持奋斗,造就了一大批各科优秀人才,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一

大盛事。联大继承五四精神,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浓厚的民主和学术自由的气氛,亲密的师生关系,实实在在的教学相长。这些直到如今都仍是值得我们深思,应加以发扬的。

我到重庆后,先在南开中学等校教了一年多英语。这时,我和杨苡的哥哥杨宪益、英籍嫂嫂戴乃迭初次见面。一九四〇年他们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到重庆,先在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等处任教,后入国立编译馆工作,开始了他们以后五十多年光辉的翻译事业,成为誉满中外的文学翻译家。宪益和乃迭不但是我的至亲,而且是好友,我向他们学到不少东西。一九四二年冬,我的老师柳无忌先生介绍我到中大外文系工作,在柏溪分校教大一英文。后来又有五六个西南联大外文系先后毕业的同学到柏溪任教。我和吴景荣(后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共同编注、出版了一本《现代英文散文》,是当时大一英文教材之一。在嘉陵江畔寂静的山村柏溪,除教学外,是我写作和翻译的一个丰收期。我写了不少诗和一些散文,如发表在当时大后方最有影响的大型月刊《时与潮文艺》上的《阿虹的诗》、《金色的橙子》等。我同时翻译了斯丹达尔的杰作《红与黑》、梅里美中短篇小说《嘉尔曼》等、法国象征派代表作之一《醉舟》,以及英美现代小品等。也从这时起,我就一直在中央大学(一九四六年夏,抗战胜利后第二年,我们一家随学校复员到南京定居)和解放后的南京大学外文系工作;一九五三年春又从外文系调到中文系,直至现在,前后五十多年了。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其间,一九五三年秋至一九五七年夏,根据《中德文化协定》,我被高等教育部派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卡尔·马克思大学(即莱比锡大学)东亚学系任客座教授四年,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等课;为培植德国年轻一代汉语言文学和汉学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的人才作出了一些贡献,得到好评,并获得优秀教师奖。其间,一九五五年十月,国际东方学会议在莱比锡大学召开,我国派出吕振羽先生为团长,季羨林、刘大年两先生和我为团员的代表团参加。我在文学组上宣读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德文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比较系统地介绍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和主要成就较早的一篇长文。一九八一年十月,我又蒙莱比锡大学校





赵瑞在德国访学期间的留影

长的邀请,重访德国,参加该校纪念东亚学系建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在柏林洪堡大学汉学系(当时系主任就是我以前的学生弗里兹·葛柳南 Fritz Gruner 教授)作了一次关于鲁迅、沈从文、巴金三位作家研究近况的报告,很引起兴趣。二十五年后,旧地重游,激动不已,但也不胜感慨,几位我所熟悉的德国老一辈汉学家和其他好几位莱比锡大学同事朋友都已先后去世了,我到他们的墓前一一献了鲜花。在德国讲学时期,我也曾几次访问苏联、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认识了好几位汉学家,如捷克著名的中国文学专家、鲁迅《呐喊》等译介者普实克教授

(Jaroslav Prusek)。这期间我前后写了一些诗和散文,歌颂和平、人民友谊和国际文化交流。一九八二年以来,我曾到北京、天津、武汉、上海、杭州、绍兴、金华、青岛、桂林、西安、南宁等地讲学或参加学术研讨会,主要是关于外国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又应邀到印度参加新德里举行的“首届国际翻译文学学术研讨会”,并到尼赫鲁大学中文系作了一次关于“南宋词人姜夔及其名作《暗香》与《疏影》”的演讲,播放了这两首根据白石自度曲谱以琵琶、二胡、箫伴奏,由北京一位女歌唱家独唱的咏梅词磁带录音,引起强烈的反响。印度朋友是初次知道这些,初次听到了这样美丽的诗,这样美丽的乐曲。我又三次到香港讲学,在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参加比较文学、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认识了不少位港台的学者、诗人和作家,受到热情的接待,促进了互相了解,很有意义。

我从小就喜欢游山玩水，留恋于自然美景，花鸟虫鱼；我的故乡温州那么优美的风景物华早已吸引了我的心灵。我上初中读书的地方恰巧就在纪念我国第一个山水诗人、刘宋时代“才高词盛，富艳难纵”的大作家谢灵运的“春草池”边。我的家乡有名山佳水，尤其是瓯江、楠溪江、雁荡山、江心孤屿、茶山五美园、九山落霞潭、仙岩梅雨潭，等等。历代诗人作家如谢灵运、李白、杜甫、孟浩然、韩愈、陆游、叶适、永嘉四灵、林景熙、文天祥、袁枚等，直到现代朱自清、郭沫若等都曾歌唱过这片秀丽的山川。我便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和文学影响中获得了最初的诗的营养；可以说，我是从山水之恋到诗之恋的。



解放初期时的赵瑞燕

还有三十年代动荡不安的世界，黑暗腐败的社会和中华民族深重的危机引起了少年时的忧伤和愤慨，促使我十六岁（一九三一年）时开始写新诗（现存我最早的诗是《雷雨》和《烟火献辞》两首，均作于一九三二年）。长期以来，我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把它看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关于这些，我在一九四四年《红与黑》译者序，特别是一九八三年出版的诗集《梅雨潭的新绿》（这是我五十年来诗歌创作的一本选集）自序中有较详尽的叙述。

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前这一阶段，由于时世动荡，社会不安，生活紧张，我除在中大教书外，曾在外面兼差，成天忙碌，没有闲暇写诗，只翻译出版了一本《爱的毁灭》（斯丹达尔短篇小说集）。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我在悲愤中写了一首诗《遥祭》，以志深切的哀思（五年后，即一九五一年，闻先生殉难五周年时，我又写了一首



五十年代的赵瑞蕻

长诗《从烛光到阳光》)。一九四七年“五二〇”时,我和杨苾、杨宪益(他们那时都在编译馆工作)支持“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正义斗争,签名捐款,慰问受伤青年学生。当时宪益还和朋友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开了一个“绛社”古董店,作为联络点。总之,那时我们都期待着曙光涌现,胜利的红旗卷过长江,飘扬在紫金山上。

在解放初期,我以炽热的心胸,欢快的调子,写了很多诗,歌颂新的时代,新的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参加“土改”,写了《土地上的光》等诗;抗美援朝

时,写了一首叙事长诗《三个美国兵》。那时南京文艺界十分活跃,很有新气象。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成立了南京文联,我被选为委员。我又与许多同志在一起,组织“诗联”,编印了两本《诗红旗》,并与上海“诗联”合办当时国内第一个诗刊《人民诗歌》;提倡诗歌朗诵,开了好几次诗朗诵会。同时,我迷上了马雅可夫斯基,翻译出版了一本《马雅可夫斯基研究》(一九五〇年),一本马雅可夫斯基的杰作长诗《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九五一年)。

新中国成立四十五年来,我在教学、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翻译四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些努力,比以前付出更多的劳动,取得了一些成绩,尤其是学术研究方面。可以说,这是我第二个丰收期。

首先我是一个教师,我热爱这个职业,一直认为教师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称号。我永远怀念和感谢我敬爱的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师们!五十多年来,我